

林远辉 编

朱杰勤教授 纪念论文集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

林远辉 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

林远辉 编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高发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穗成贸易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90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1-1949-6/K·74

定价：16.00 元



著名史学家朱杰勤教授遗像

目 录

怀念朱杰勤教授（代序）	姚 楠（1）
朱杰勤传略	杨安尧（5）
《林则徐与国际法》序	朱杰勤（13）
阿拉伯世界在陆海“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 ...	陈 炎（21）
汉唐巴蜀与中西交通	陈玉龙（54）
论领事裁判权在我国的肇始	张劲草（78）
唐代名禽阿滥堆	蔡鸿生（93）
孙中山与越南革命	徐善福（97）
海外竹枝词与中外文化交流	丘 进（106）
京师同文馆述略	郭维勇（127）
关于“桂家”的几个问题	袁 丁（142）
丝路北道上的交通支线和重要城镇	纪宗安（156）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茶叶贸易	张应龙（173）
中国与东南亚古代友好关系的顶峰	林远辉（205）
附：朱杰勤教授著译目录	林远辉辑（229）
编后	（241）

怀念朱杰勤教授

(代序)

杰勤先生辞世，倏将五载。我与他相交五十春秋，1989年因赴港访问港大与中大，得在广州暨南大学把酒言欢。孰料仅隔半载，即闻噩耗，悲痛莫名。今悉先生友好弟子议出纪念文集，深感宽慰。编者嘱为之序，敢不从命，奈以年已老迈，病魔缠身，久未执笔，特将旧作一篇奉献，以作纪念。原文载新加坡新闻与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的拙作《星云椰雨集》，题为“记朱杰勤”。

*

*

*

南洋学会最老的会员中，健在者已不多，朱先生即其中之一。我认识朱老是在重庆。1942年3月我到重庆时，旧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合办的南洋研究所已成立。杰勤先生任研究员兼史地组组长，我任研究员兼经济组组长，在一间屋子内办公。其实，我写南洋经济方面的文章，是在后来进旧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后才正式开始的（当然在新加坡时已写过一些，如为《星洲日报》写过一篇关于征收所得税问题的社评等），在南洋研究所时主要还是从事史地研究。

不过，我看到杰勤兄的大作，则在见面之前。1940年，我与许云樵、张礼千两兄负责《星洲日报》副刊《南洋史地》、《南洋

经济》和《南洋文化》的编辑工作，杰勤兄则在国内中山大学任教。该校原设广州，日军南侵后，迁至云南。《南洋史地》刊载国内学者的文章，只有杰勤兄所写《英国东印度公司之起源及对华贸易之回顾》一篇，所以我很注意。据他自己说，系由友人介绍，和云樵兄通信，交换学术上的意见。大概是云樵兄向他索稿，所以他投寄此文。这篇文章在《南洋史地》连载五期，云樵兄还介绍了作者的简历和著作。最近我和杰勤兄见面时谈到这篇文章，他却把题目都忘记了。幸好我尚保存着《南洋史地》全份，便复印了寄给他，以便他收入文集。

杰勤兄原籍广东省顺德县，自幼聪颖过人，国学造诣很深，后入西塾习英语，亦有写作能力。1933年，他以所写《中国史学研究》一文报考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被录取为研究生。他的指导教师是南明史专家朱希祖教授（后任重庆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对他后来研究亚洲和国际关系史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很有影响。朱希祖教授与我亦有一段文字缘，这已在别处谈到，就不多讲了。1944年，希祖先生逝世，杰勤兄写了《朱师希祖（逊先）哀词五首》，其中有“劝我留心边政学，将来希望济时艰”之句，可见希祖先生确实对杰勤兄后来研究东南亚史和中西交通史作过鼓励和指导。

杰勤兄与云樵兄的才学是可以媲美的。他们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知识广博的人，研究范围不仅限于东南亚史，而且涉及许多学科。云樵兄的大作，星洲人士有口皆碑，杰勤兄的著译，则有《秦汉美术史》、《龚定盦研究》、《王羲之评传》、《中西文化交通史料译粹》、《亚历山大故事》、《亚洲各国史》、《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大秦国全录》、《中国古代史学史》等等。可以看出他的学问，非我这样只能在一个狭窄范围内探索之人所可比拟。而且，云樵兄和杰勤兄两人都擅诗词，所以一个可谓“吴门才子”，一个堪称“粤东博士”。然而，这两人竟未谋一面。云樵兄逝世后，杰勤

兄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为《许云樵与东南亚研究》。我看到其中一节，很有所感，摘录如下：

“龚自珍诗云：‘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许先生不仅精于东南亚史地学，对于文学亦有湛深的造就，有《希夷室诗文集》行世。他对医学和药理学亦有研究，并都有著作出版，可谓一专多能的大才了。他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好榜样。”

其实，杰勤兄也是“一专多能”的大才，有《微雨集》诗词问世，所以他用以称颂云樵兄的，也可以为他自己作恰当的评价。

在重庆，杰勤兄与礼千兄共事之日较多。1943年，礼千兄大著《倭寇侵略中之南洋》（上册）易名为《中南半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请杰勤兄审读，杰勤兄阅后题诗代跋。诗共五首，谈到东南亚研究。兹录四首于下：

（一）兀兀穷年岂为身，我人宿志在斯文；新书不敢私囊橐，收拾遗闻理放纷。

（二）汉学方家戴宏达（J. J. L. Duyvendak），郑和知己伯希和（Paul Pelliot）；战时朴学殊荒落，珍籍流传海外多。

（三）异军突起有苍头，半载书成笔力道；扫尽浮言夸创获，十洲典籍一时收。

（四）南洋研究最精纯，共说专家有几人；寿世润身原一揆，超超元著不为贫。

杰勤兄所写诗词不尚空谈而富有生活气息，或论时事，或谈学问，正如他在《微雨集》凡例中所说：“作者之生活思想及环境与乎当世治乱之道，粲然现于纸上。”他在西域南海史地专家冯承钧先生逝世后，曾作长诗悼念，长达千言，国内各报竞相刊载，传诵一时。此诗曾与他悼念冯先生的长文一并发表于《南洋学报》第四卷第一期。

杰勤兄与礼千、云樵和我，可谓南洋研究的知己，但是他与

云樵兄未见过面，与礼千兄则在1945年昆明分别后恐也没有再相聚过，但近年来和我见面的机会却较多。他比我小一岁，健康情况和我差不多，不过责任很重，兼职不少，社会活动很多，除负责暨南大学历史系和华侨研究所的工作并兼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外，还担任了好几个学术团体的领导。听说他将在数年内写出一本高水平的《东南亚华侨史》，这是东南亚研究工作者所殷切盼望的。

*

*

*

杰勤先生学问渊博，著译等身，晚年仍孜孜不倦，主纂《东南亚华侨史丛书》、《中外关系史词典》，并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为后世之楷模，特再附缀数语，以表景仰之意。

姚楠

1995年2月于上海

时年八十有四

朱杰勤传略

杨安尧

朱杰勤教授(1913—1990)，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
中外关系史博士生导师。

—

朱杰勤，原籍广东省顺德县，1913年农历五月初八（1913年6月12日）出生于广州。父亲是马来西亚归国华工，商店雇员，读书不多，但思想开朗。母亲对子管教甚严，要他勤学诗书，尊敬长辈，不贪便宜。他自幼聪明好学，记忆尤其好。从5岁起，便由闲居的伯父教读《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及《唐诗三百首》等书，虽不理解，但背诵如流。7岁时，为强身健体，曾被父亲送到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学习武艺一年多。10岁那年，他进入私塾受业于张之洞得意门生罗隰甫先生，学习经史学，并初步奠定他的中文基础。14岁时，转到英文学校，三年后已达到能写能翻译的程度。以后，他再没有机会进中学、大学读书了。他认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内，一个人如有独立研究能力，辅以充分的参考图书，通过刻苦自学，目的明确，持之以恒，迟

早会有所成就的。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辍学后在商店里当杂役。在工余时间，他在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函授学校，读完了中文、英文、数学、商科等专业的专门课程。1933年夏，中山大学招考史学研究生，他看见报考条件中一条，说有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亦可报考，便跃跃欲试。在强烈的求知欲下，他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中国史学研究》一稿，约8万字。送去审阅，结果认为可以投考。他的试卷得到顺利通过，由著名史学家朱希祖（逖先）先生录取，从此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朱杰勤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后，在朱先生的指导下，研究秦汉史。在学习期间，他撰成《秦汉美术史》一稿，作为毕业论文，并被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书。此外，又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

他毕业后，即得著名画家高剑父介绍到广州美术学校，教授国画史。1937年夏，他接受中山大学之聘，回母校任教，主讲中国艺术史。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陷广州，他全家奔回原籍顺德县古粉乡。他在广州的住宅被日军烧毁，所有衣物、书籍和文稿付之一炬。不久乡中故居遭匪劫，被迫流寓香港。

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迁到云南澄江。朱杰勤和一些师生由香港取道越南，转回本校复职。1940年，他曾一度在昆明空军学校任编译。1942年转入旧教育部和侨委会在重庆合办的南洋研究所工作，担任史地研究员兼组长，与张礼千、姚楠两位富有学识和经验的学者共事。1943年转入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任印度史和泰缅史教授。他除自编讲义外，还翻译英人哈威的《缅甸史纲》并撰写一部《中南半岛史》，以供学生参考。两稿各约20万言。不幸的是前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后者在解放前为贵阳

文通书局接受后遗失。1945年，他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担任世界古代史教授。

1950年，朱杰勤由云南大学调入云南军区司令部，在参议室主持东南亚研究工作。两年后又调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亚洲史教授，并主持亚洲史教研室（后改为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他开设的《亚洲各国史》课程，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同时开设。他与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合编《亚洲各国史教学大纲》，于1957年由高教部审订印行，供全国从事亚洲史教学和研究者参考。而他编写的亚洲史讲义，也被高教部作为全国交流讲义。1958年他的《亚洲各国史》出版，流传中外，东南亚华侨史专家、英国人珀塞尔（或译巴素）的名著《东南亚华人》，把它作为主要参考书之一。

1958年，朱杰勤调出中山大学，参加暨南大学的复校工作，成立历史系，并担任主任。1961年，他讲授中国史学史。由于当时缺乏适当的教材，他撰成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此书在1980年出版，成为解放以来我国最早出版的中国史学史，反应良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暨南大学曾一度停办。此期间，朱杰勤转到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他又重返暨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华侨研究所所长、中外关系史博士生导师，在此期间，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中国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全国中亚研究协会副理事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史研究会顾问，世界古代史研究会顾问，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顾问，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历史学会顾问等职。

朱杰勤晚年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研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工

作。1989年国际海事研究协会邀请他入会，并请他参加199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大会。正当他积极筹备、迎接1991年联合国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来广州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之际，由于承担过多的工作，长期操劳过度，他突患心脏病，于1990年5月9日溘然长逝，终年77岁。

朱杰勤教授教书育人50多年，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精心栽培新生力量，鼓励后来居上者，倍受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1989年，他获广东省高教局授予“普通高等学校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他辛勤笔耕50多年，著作等身，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及海内外不少学者，纷纷发出唁电（函）痛悼他的逝世，认为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二

朱杰勤研究史学是从中国史到世界史，最后以中外关系史为归宿。他说：“一位名副其实的史学家不仅要通古今之变，还要沟通中外，成一家之言。这就是说，不仅要懂得中国史，还要懂得世界史和中外关系史。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说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他特别注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1940年他写成《龚定盦研究》一书。此书是研究龚自珍（定盦）的第一本书，至今还有足供参考之处。同年，他加入由姚楠、张礼千、许云樵、郁达夫、关楚璞等学者在新加坡组织的“南洋学会”，成为首批会员。他常在《南洋学报》、《南洋商报》等报刊发表关于南洋史地的论文。他翻译了多篇外国史学家关于中西交通史的论文，并撰写了几篇有关的文章，编成《中西交通史译粹》，194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时期，朱杰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40年代，泰国曼谷杂志社聘请他为特约撰稿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吸收他为会员。为了介绍外国史学者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著，朱杰勤翻译了《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利奇温著）和《大秦国全录》（夏德著）两书，于1962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应中华书局之邀，他重新校订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凡6册，于1979年出版。

60年代初期，他向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发展东南亚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具体意见和计划。由于十年内乱，此事遂废。打倒四人帮后，1979年，中国历史学会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他又在会上作了《关于大力发展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问题》（中国历史规划会议材料之五）的学术报告，并建议成立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他还先后在各报刊发表了十多篇宣传文章，推动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他身体力行，不顾年迈，大力培养人才。从1982年起，培养了4名硕士生，8名博士生。他为推动中外关系史这门学科的发展，不遗余力。

朱杰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同时，也非常重视华侨史的研究。80年代初，他积极参与筹办全国最早的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学术机构——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工作，并任该所所长。他说：“华侨史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今天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尤有现实意义。”70年代末，他便开设了《东南亚华侨史》课程。其讲义，后经整理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1年他参加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写了一份《关于编写华侨史的倡议书》，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不久，他主编“东南亚华侨史丛书”及“世界华侨史丛书”，这是他组织指导暨南大学十多位中青年学者撰写华侨历史的巨大工程。至今已出版了5种，有些著作还获了奖，得到各方的好评。他作为主编和组织者、指导者，对推动我国华侨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任暨南大学华侨

研究所所长的短短几年间，出版了《华侨史论文集》共4集、《华侨教育》2辑、《华侨研究》1册。

他为发展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外，自己还争分夺秒研究中外关系史。他著作甚丰，成绩斐然。《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和《中外关系史译丛》两书，集中了他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精华，国内外杂志先后有文章予以介绍，美国《远东季刊》特向汉学界推荐。世界知名学者费正清、珀塞尔及惠特利等人的著作都引用过他的研究成果。一些著作还被日本、台湾及香港的书局所翻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1987年，他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被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评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授予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在朱杰勤的著作中，有《微雨集》和《英诗采译》两本诗集。朱杰勤自谓对文艺的兴趣大于史学，所看过的文艺作品多于史籍。他尤偏爱诗，对于杜诗其曾下过七年功夫，并深受影响。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应爱好广泛，这对增进学识和提高工作能力是有益的。当年，著名中西交通史学者冯承钧先生去世时，他曾写《悼冯承钧先生》一诗，长达千言，其时新加坡《南洋学报》和国内许多报刊争相刊载，人们争相传诵。

朱杰勤治学谨严，做学问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说：“中外关系史要求高，难度大。学者既要懂中国史，也需要懂外国史，又需要掌握关系史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能够掌握古汉语，利用古代文献，又要精通一门以上的外语，能够运用外文资料。学者还必须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他正是用这些要求来要求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

三

朱杰勤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旧式书斋中度过的，因而使他成为一个好读书不问政治的知识青年。抗日战争爆发，革命的洪流把他从书斋里冲了出来，并被当前的事实启发了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他和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发表了不少抗日的文章。在香港逗留期间，他得到进步朋友的启发和帮助，开始倾向马列主义，并加入“英国左翼读书会”，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同时把《共产党宣言》译为中文，加以注疏，撰成《共产党宣言释文》一稿，约40万字（此稿至今还保存着）。通过这次学习，虽然一时未能完全改造他的旧思想，但至少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上、行动上不会同共产党对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挑起内战，施行文化专制政策，残酷迫害进步分子，强行禁止破坏学校的教学和研究。朱杰勤仗义直言，以犀利的笔锋，抨击反动政府，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昆明解放前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自动加入群众组织——义勇总队，为保卫昆明作出了贡献。

朱杰勤于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1959年，他在自己家庭生活仍很困难的情况下，将《亚洲各国史》一书的稿费1000余元全部捐献给广州氮肥厂的建设；自1961年起，他陆续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参加劳动。十年动乱期间，他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但丝毫未能动摇他对党的信念。他从未向党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是他时刻勉励自己、要求家人、教导学生的

箴言。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进一步实践他的箴言。他的言行早已证明了他是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就在他去世的前夕，他所在的党总支一致推举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得到学校党委的批准。他在自己的传略中说过：“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应自强不息，继往开来，不怕牺牲，死而后已。”朱杰勤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有关朱杰勤的学术生涯，早在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名人辞典》即载有他的简历，杨家骆编的《中国名人图鉴》介绍过他，1989年美国传记编纂所出版的《国际杰出名人录》刊登了他的生平，并颁发了证书。

（作者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资料室副主任、馆员，先生的大儿媳）